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 内涵结构与量表开发

张姝 朱艳

摘要: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对于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事业,提升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服务质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明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聚焦于我国民族地区独特的制度和情境,通过扎根理论和因素分析,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结构和测度量表。具体而言,首先借助扎根理论,通过深入剖析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育故事,以揭示其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及其维度;其次,通过编制量表和进行因素分析,以探索、验证并明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测度。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民族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和地理经济环境是导致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复杂多元的首要因素;第二,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自我实现”成为与中国制度文化情境和教师职业公共性紧密关联的两个新维度。

关键词:公共服务动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量表开发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518

收稿日期:2024-07-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与培育研究”(23BSH11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姝,女,重庆巫溪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E-mail: 272046234@qq.com;

朱艳,女,贵州毕节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①。公共服务作为建设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支撑,不仅对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至关重要,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我国民族乡村地区,这些地区融合了革命老区、边疆地区以及贫困地区的特征^②,往往面临资源匮乏、教育落后等挑战,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直接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教育、乡村人才储备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激发乡村教师公共服务的动机,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致力于打造“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③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② 冯江英《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③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的乡村教师队伍,后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的相继出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其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职责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但由于“在整个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且在制度上缺少一种有效的乡村教师稳定供给渠道”^①,当前民族地区仍面临教师乡村从教意愿低、向城流动性强、教师专业性亟待提升等现实困境,部分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处于低迷状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教育公共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破解这一难题,部分学者立足于教师职业的“利他性”,从坚定教育信念^②、重塑新乡贤角色^③等出发;抑或是立足“经济人”假设,从提升薪酬与福利待遇等方面出发^④,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然而由于现有研究缺乏相应测量工具,以致难以评估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并且在完全利他或完全利己的人性假设下,虽能在理论上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公共服务的水平,但现实中教师的人性本质更为复杂,包含了利己与利他的多重特征。因此,本研究聚焦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旨在通过探索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容与测度,在特定情境下开发科学、合理的测量量表,以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为激励教师积极投身乡村教育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提供依循。

二 文献回溯

本文主要从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维度和测量方法,以及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辨析

1. 西方语境下“公—私”二元对立的公共服务动机之辨

李蔚认为西方的公共性理论根植于欧洲启蒙运动后的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是以“公—私”二元对立关系为前提的^⑤,作为公共性理论下属概念的“公共服务动机”,在西方语境中,也同样存在着“自利性”与“利他性”二元对立的情况。

Rainey 最早用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一词来表述与公共服务相关的特定动机^⑥。直到1990年,Perry和Wise才在Rainey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将公共服务动机定义为“个体对主要或仅仅根植于公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出反应的一种倾向”^⑦,并从理性动机、规范动机以及情感动机阐释其构成。自此,该定义广受学者认可与采纳,但也有学者质疑其理性动机中的自利性是否应纳入公共服务动机中。在早期,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基本是完全的“利他主义”取向。如Brewer和Selden就将公共服务动机描述为“促使个人进行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动机力量”^⑧。Kim和Vandenabeele更是提出应从自我牺牲出发,将公共服务动机划分为工具性、价值性和认同性动机^⑨。然而,2016年Ritz等人提出公共服务动机很大可能是由利他主义和自利主义共同推动,用“自利性”与“利他性”二分法观念来看待公共服务动机是错误的^⑩。

2. 中国语境下“私”融于“公”的公共服务动机之析

① 容中逵、杜薇《乡村教师难以稳定供给的系统辨证与诊断施疗——兼论以师范生分配为主体的乡村教师供给问题》,《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6期,第55—57页。

② 严秀英、黄雪花、周红伟《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育信念的生成与发展——基于终极责任视角的教育叙事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第111页。

③ 闫闯《走向“新乡贤”: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困境突破与角色重塑》,《教育科学》2019年第4期,第77—80页。

④ 赵鑫《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7—138页。

⑤ 李蔚《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77页。

⑥ Sangmook Kim, Wouter Vandenabeele,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0, no. 5 (2010): 701.

⑦ James L. Perry, Lois Recascino Wise,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0, no. 3 (1990): 368.

⑧ Gene A. Brewer, Sally Coleman Selden, “Whistle Blowers in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New Evidence of the Public Service Eth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8, no. 3 (1998): 416-417.

⑨ Sangmook Kim, Wouter Vandenabeele,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0, no. 5 (2010): 701.

⑩ Adrian Ritz, Gene A. Brewer, Oliver Neuman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Outloo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 no. 3 (2016): 423.

在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研究是概念先于事实的研究,2007年才开始有中文论文发表,且大多遵循西方“利他主义”原则,少有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概念进行本土建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纷纷呼吁从中国独特的情境与价值体系出发,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如2015年之前,部分学者基本沿袭西方单一的利他主义,将其界定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利他动机^①。2015年之后,开始有学者从混合动机角度出发界定其概念。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通过社会化的形式,个体对其自身公共身份产生认同,包括工具性、制度性和情感性动机三个方面”^②。陈重安、许成委就主张从“公共服务”行为出发,重新界定公共服务动机概念,认为学界将其界定为利他动机、亲社会动机或内在动机,同时注入价值、信念及态度等诸多要素,已使其脱离了动机本身的意义^③。苗青更是直接呼吁回归中国现实场景和制度以及具体对象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④。

中西方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研究的分歧在于,其文化制度下社会对“公”、“私”二者关系的看待不同。在中国,“公”与“私”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公”往往与善相联系,“私”常与恶相关联,两者间常呈现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即“私”服从于“公”,社会也一直倡导“竭私尽公”、“公大于私”、“小我融入大我”等公共伦理观念。正是在这种“私”从于“公”,“私”融于“公”的社会背景下,公利与私利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公共服务行为本身也不完全是毫无个体“私欲”的彻底的“完全利他”。因此,在引进公共服务动机这一舶来概念时,不能简单地移植借用,而必须结合中国的文化制度场景,要从历史、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社会运行的底蕴和既有民情,也需观照中国特有的制度情境,即从政党高度嵌入社会、引领社会、组织社会、形塑社会的基本逻辑出发^⑤,来探析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行为本身背后所蕴含的动机。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维度

1. 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结构:稳定的“三足鼎立”

1990年,Perry和Wise基于Knocke与Wright-Isak的“倾向/机会”模型^⑥,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与情感动机构成^⑦。后续研究都主要呈现为对该结构的继承和批判。如Abane和Phinaitrup就直接借鉴该结构^⑧。刘华兴和王铮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境证实了该结构,只是其具体意涵表述与Perry和Wise的观点略有差异^⑨。Kim和Vandenabeele则认为理性动机中包含“利己”成分,不符合“完全利他”原则,并且指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将公共服务动机重新解构为工具动机、价值动机和认同动机^⑩。文博和陶磊则结合Perry及Kim等人的研究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由工具性、制度性和情感性构成,并认为工具性动机是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⑪。

2.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文化与制度的实证分野

最初,Perry基于美国历史背景,将公共服务动机的初设维度简化为“公共政策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维模型并开发了相应量表^⑫。此量表随后被多国学者广泛使用,但因文化和

①叶先宝、李纾《公共服务动机:内涵、检验途径与展望》,《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第57页。

②文博、陶磊《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构建与绩效转换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2期,第248页。

③陈重安、许成委《公共服务动机:回顾、反思与未来方向》,《公共行政学报》2016年第51期,第69页。

④苗青《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中国场景:新框架和新议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年第5期,第18—19页。

⑤李蔚《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84页。

⑥David Knocke, Christine Wright-Isak, “Individual Mo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System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1, no. 2 (1982): 209-254.

⑦James L. Perry, Lois Recascino Wise,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0, no. 3 (1990): 368.

⑧Juliana Abagsonema Abane, Boon-Anan Phinaitrup,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Moti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Construct in Ghana,” *Management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4, no. 1 (2022): 58.

⑨刘华兴、王铮《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测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16页。

⑩Sangmook Kim, Wouter Vandenabeele,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0, no. 5 (2010): 703-704.

⑪文博、陶磊《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构建与绩效转换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2期,第245—248页。

⑫James L. Perry, “Measur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Assessment of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6, no. 1 (1996): 5-22.

制度差异,其在各国应用中逐渐显露情境失配问题^①。故不少学者对 Perry 量表进行修订,出现了多种维度的测量模型。如在亚洲国家, Kim 发现“公共政策吸引力”维度在韩国不适用^②。刘帮成等人的研究则显示“同情心”维度在中国未得到证实^③。殷强认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公共服务动机还应在 Perry 基础上增加“爱国主义”和“伦理道德”两个维度^④。此外,在文化背景相近的欧洲国家, Perry 的四维模型同样受到质疑。如 Ballart 和 Riba 针对西班牙行政传统提出了“政治忠诚”这一新维度,并发现五维度模型在西班牙更为适用^⑤。

尽管当前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维度基本是对 Perry 研究的批判继承,且在其测量上存在较大争议,但仍可得出以下共识:其一,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组成较为稳定,目前学界集中在两种组成结构讨论上,一种认为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少部分学者则认为其由“工具性动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构成,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前者理性动机包含了自利性动机成分;其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是争议集中的地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同文化制度下,各国对“公务员”、“公共服务”意涵的认知与理解不同;二是由于语言习惯不同,量表的翻译使用可能使研究者难以得到准确测量。

(三)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法

既有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方法可分为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两种^⑥。其中,量表是测量的主要工具,测量题目选项设置通常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

1. 间接测量:回应动机的内在需求与外显行为

间接测量是通过测量与动机相关的其他变量来间接反映动机的强弱。根据所替代测量变量与动机的关系,可归结为内在需求测量和外显行为测量。其一,内在需求测量是从引发动机的因素出发,假设动机的产生源于需要,动机强弱与需要程度及其满足情况相关,由此折射动机的强弱。起初大多数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均是采用该方法,公共服务动机一词就是 Rainey 对比公、私部门员工的报酬偏好提出的^⑦。其二,外显行为测量则关注动机所引发的行为,假设动机的强弱与其引发的行为相关,认为个体的动机越强,则由动机引发的行为就越持久,出现的频率也越高。如可通过测量个体的利他行为或亲社会行为等来映射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强弱。Brewer 和 Selden 就以“举报行为”作为一种有效行为指标,预测个体公共服务动机水平^⑧。

2. 直接测量:横纵数据导向的多维度测量取向

直接测量是从公共服务动机内涵及其外延入手,并依此建立测量工具的一种测量方式。首先,从测量工具来看,典型直接测量工具是 Perry 的四维度量表,而常用的跨文化直接测量工具是 Kim 等人开发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动机量表^⑨。其次,从测量数据来看,可分为横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前者通常用来开发、验证或修订量表,或用以了解某个体或群体在某时间点上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及在此基础上作对比研究等。如

① 杨开峰、杨慧珊《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中国化》,《治理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64 页。

② Sangmook Kim, "Testing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Korea: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 no. 4 (2009): 848-849.

③ Bangcheng Liu, Ningyu Tang, Xiaomei Zhu,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Generalisability and Instrumen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9, no. 8 (2008): 684.

④ 殷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评价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5、52 页。

⑤ Xavier Ballart, Clara Riba, "Contextualized Measure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The Case of Spa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3, no. 1 (2015): 1-16.

⑥ 李小花《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及测量》,《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797 页。

⑦ Hal G. Rainey, "Reward Preferences among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rs: In Search of the Service Ethic,"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 no. 4 (1982): 288-300.

⑧ Gene A. Brewer, Sally Coleman Selden, "Whistle Blowers in 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New Evidence of the Public Service Eth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8, no. 3 (1998): 414.

⑨ Sangmook Kim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cross Populations: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and Addressing Issues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3, no. 1 (2012): 79-102.

Abane 和 Phinaitrup 就使用横截面设计,直接测量地方政府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①。与之不同的是,纵向数据测量关注的是动机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和变化,能够揭示、预测动机的动态性和趋势,或是通过纵向数据追踪以探究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后效及中介等因素。如 Holt 就通过追踪纵向数据,探究高中公民课程与校本社区服务对高中生公共服务动机发展的影响^②。

总之,直接测量已是当前研究的主流,而多维度的“量表取向”成为主导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主要工具。在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进行开发时可借鉴以下经验:其一,间接测量优点在于,通过测量动机产生的需求和外在行为表现,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公共服务动机的强弱,同时避免人们对其隐瞒和夸大;其二,直接测量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开发的主流方法,而当中的横截面数据则是测量工具开发的主要数据源。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Ritz 等人就指出,尽管实证研究中横截面数据研究占比高达 81.3%,少有纵向数据的测量收集,但随着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深入,纵向数据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③。

(四)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

1. 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移植

既有研究多是直接移植沿用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体系和测量框架,少有针对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开展教师公共服务的动机研究。首先,从概念来看,目前关于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界定,多是将教师作为众多公职人员中的一类群体,通过迁移公共服务动机的一般性概念进行再界定。其次,从前因、后效及中介因素来看,研究仍集中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共性因素研究。鲜有学者从教育的独有因素出发,探究教师公共服务动机与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习成就之间的作用关系,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因果机制的“黑箱”尚未有研究触及。最后,从测量工具来看,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量表基本是对 Perry 量表的使用或再开发。如李明军和刘亚编制的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虽是依据 Kim 与 Vandenabeele 等的四维度理论^④,但实际也还是对 Perry 四维度模型的继承发展。

然而,从教师职业的本质属性来看,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工作天然蕴含着崇高的公共使命。尤其在中国,教师自古就被尊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有着较高的奉献精神。故将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公共服务动机,并直接移植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和测量工具,一方面,这会使得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的内容效度变低,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动机构成要素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另一方面,也将导致测量结果不明,无法真实准确反映教师在公共服务中的实际动机和行为。

2. 教师从业动机研究:具有文化底色的混合动机

虽然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我们仍可从相近的从业动机研究中窥见一二。既有关于教师从业动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研究多从“经济人”视角,关注教师个体层面上的择业、从教、专业发展等动机,并探究这些动机与离职意向、职业认同及职业倦怠等间的关系。如赵飞等人就从教师择业动机出发,探究其对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影响^⑤。其二,少数学者从“利他主义”的视角,研究教师从业动机。如唐燕就从“道义动机”出发,认为教师道义动机是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必须履行的职业要求,是教师的法定义务^⑥,强调教师应具备较高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三,在动机的理论基础上,学者从教师个体出发,从心理学角度关注“动机”,指出自我决定理论、期望价值理论、成就目标定向理论是教师动机研究的主流理论^⑦,可用以解析教师动机的内在机理。此外,也有学者从动机的文化底色出发,指出“文化与动机是

①Juliana Abagsonema Abane, Boon-Anan Phinaitrup,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Moti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Construct in Ghana," *Management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4, no. 1 (2022): 72.

②Stephen B. Holt, "The Influence of High Schools on Develop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no. 1 (2018): 1-39.

③Adrian Ritz, Gene A. Brewer, Oliver Neuman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Outloo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 no. 3 (2016): 417-418.

④李明军、刘亚《中小学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编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1期,第367页。

⑤赵飞等《中学教师择业动机、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1期,第121页。

⑥唐燕《为什么从事德育?——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的道义动机及其建构》,《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6期,第9页。

⑦芦咏莉、栗子童、乔森《国外教师动机理论及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第67页。

不可分割的”^①,动机形成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并与由文化而社会化的情感密切相关^②。

随着国际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趋势向更加情景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不同情境、不同特殊人群的研究,以充实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增加其概念的内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作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背景都具有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因此,聚焦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在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进行研究时,我们可借鉴已有教师从业动机的研究经验:一是兼顾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利己与利他,突出强调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私融于公”的混合动机;二是回应动机的文化底色,凸显公共服务动机的本质也是“动机”,回应文化的社会化动机。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与我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时代命题相关联,需要基于我国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情境,探究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实质和测量维度。因此,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建构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维度,以此作为测量量表的编制依据;然后,编制量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基于客观数据对量表进行调整,并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以澄清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测度,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组织、管理、激励等理论研究及实践运用提供科学的测量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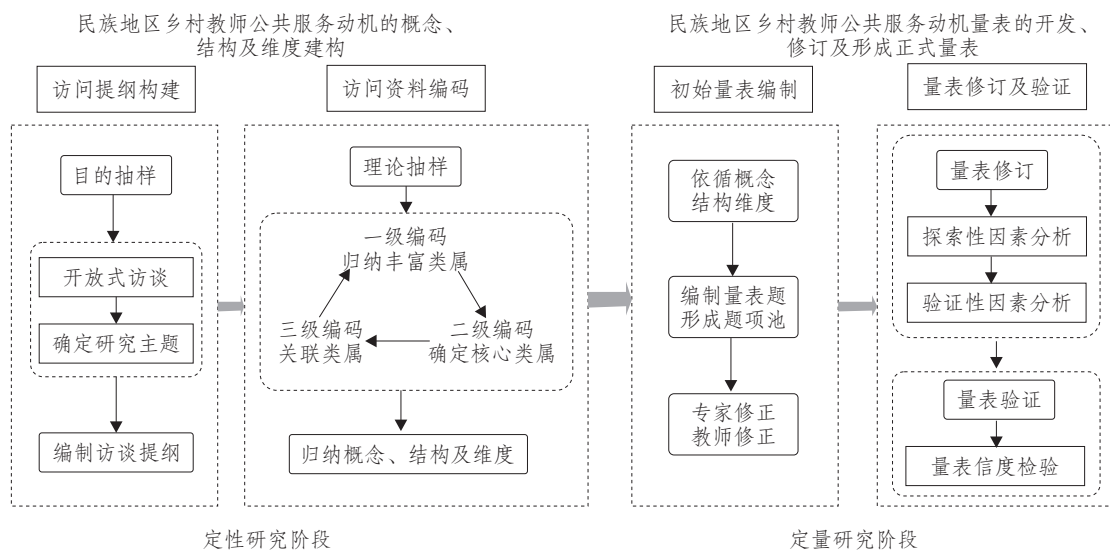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图

三 定性研究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构建

(一)研究方法及思路

扎根理论“缘起于科学的逻辑、实用主义、符号互动论和工作社会学,主张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透过一系列‘搜集、分析、比较;再搜集、再分析、再比较’的交替过程中,不断地以归纳的方式做比较分析,以建立反映社会现象的理论”^③,因而,该方法常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较为科学的方法。在此,我们除参照 Corbin 和 Strauss《质性研究的基础:发展扎根理论的技术和程序》中所介绍的扎根理论路径外^④,还主要借鉴了陈向明

① Margery B. Ginsberg, *Transformative Professional Learning: A System to Enhance Teacher and Student Motivation* (Corwin, 2011), 16.

② 毛菊《玛杰里·金斯伯格教师学习动机论及评价》,《外国教育研究》2016年第9期,第27页。

③ 钮文英《质性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4年修订版,第398页。

④ Juliet Corbin, Anselm Strauss,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2014), 180-192.

和王富伟本土化改造的三级编码路径^①,以提炼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结构及其测量维度指标。

(二)理论取样及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取样,其核心在于选择能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注重概念的代表性而非个体的代表性。调研团队在2023年3月至2023年11月期间进行了三轮访谈资料收集。第一轮是开放式访谈,以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其公共服务动机的认识及其现状,并以此编制访谈提纲。第二轮是抽取目标学校进行结构式访谈,调研团队根据第一轮访谈教师培训情况及其所在学校的民族文化环境分析,最终选取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J乡村小学作为访谈学校,以确保受访者在公共服务动机方面的代表性。第三轮是对已有访谈资料的进一步补充。

在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对受访者所在的乡村学校进行了背景调查,并与受访者进行初步沟通以确保后续访谈的顺利进行。正式访谈采用一对一方式,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前提下录音并整理笔录。在访谈结束后及时整理文稿并编码,根据编码情况决定是否重启访谈,不断反复,直至没有新概念产生。最终,团队共访谈了23人(详见表1)。所有访谈均录音,且均在24小时内完成文字转换与整理,形成丰富的访谈资料库。

表1 访谈情况表

| 访谈对象 | 编号 | 民族 | 是否会少数民族语言 | 访谈次数 | 访谈时长(分钟) | 转录字数(万) | |
|---------------------------------------|--------|-----|-----------|------|----------|---------|-----|
| “国培计划(2022)”、“Q省2023年民族地区教师转型提升”的培训教师 | T1 | 彝族 | 是(彝语) | 1 | 32 | 0.7 | |
| | T2 | 彝族 | 是(彝语) | 2 | 132 | 3.1 | |
| | T3 | 彝族 | 是(彝语) | 1 | 16 | 0.3 | |
| | T4 | 藏族 | 是(藏语) | 2 | 45 | 0.9 | |
| | T5 | 藏族 | 是(藏语) | 1 | 63 | 1.8 | |
| | T6 | 汉族 | 否 | 1 | 25 | 0.6 | |
| | T7 | 汉族 | 否 | 1 | 25 | 0.5 | |
| | T8 | 汉族 | 否 | 1 | 26 | 0.6 | |
| 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J乡村小学教师 | T9 | 彝族 | 是(彝语) | 2 | 190 | 4.9 | |
| | T10 | 彝族 | 是(彝语) | 1 | 45 | 1.2 | |
| | T11 | 彝族 | 是(彝语) | 1 | 37 | 1.0 | |
| | T12 | 彝族 | 是(彝语) | 1 | 47 | 1.4 | |
| | T13 | 彝族 | 是(彝语) | 1 | 25 | 0.5 | |
| | T14 | 彝族 | 否 | 2 | 73 | 2.0 | |
| | T15 | 汉族 | 是(彝语) | 2 | 163 | 4.9 | |
| | T16 | 汉族 | 否 | 1 | 30 | 0.9 | |
| | T17 | 汉族 | 否 | 1 | 25 | 0.4 | |
| | T18 | 汉族 | 否 | 1 | 27 | 0.7 | |
| | T19 | 汉族 | 否 | 1 | 25 | 0.5 | |
| | T20 | 苗族 | 否 | 1 | 31 | 0.7 | |
| | 三轮访谈对象 | T21 | 汉族 | 否 | 1 | 24 | 0.4 |
| | | T22 | 汉族 | 否 | 1 | 25 | 0.5 |
| | | T23 | 回族 | 否 | 1 | 28 | 0.6 |

^①陈向明、王富伟《高等学校辅导员双线晋升悖论——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第81—83页。

此外,本研究团队在对 J 乡村小学教师进行访谈的同时,也对该校进行了全面的深入调查。广泛搜集了关于 J 小学所在区域的历史、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资料,力求对该地区的教育环境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利用网络资源,搜集了诸如阿力甫夏、格桑德吉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相关采访和典型事迹,以从数据上确保了研究的效度与可靠性。

(三)访谈提纲编制

访谈作为扎根理论中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对于研究者深入理解特定情境、捕捉细微差异以及提炼核心概念具有重要作用,而多种资料结合使用有利于就同样问题进行三角检验,以增强研究过程与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故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同时辅以观察法,并利用网络素材作为资料的补充来源。

为确保受访者能清晰、准确地理解访谈内容,正式访谈前研究团队通过讨论编制预访谈提纲,并广泛收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且从一轮访谈对象中选取 2 名受访者参与预访谈,根据访谈情况和受访者的建议对预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形成正式访谈提纲。具体内容如下:“您认为什么是公共服务?”“您心中的公共服务有哪些特征?”“在您看来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工作算不算公共服务的范畴?为什么?请列举具体的事例。”“您作出这些公共服务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等等。此外,这一过程中受访者不会被告知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定义,而是根据个人理解及经历自由回答。

(四)数据编码与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及结构维度构建

1. 一级编码:归纳丰富类属

表 2 T9 教师访谈资料的一级编码示例

| 原始资料(节选) | 一级编码 | | | | |
|---|--------------|-----------------|----------|-------------|-----------|
| | 概念化 | | 类属化 | | |
| | | | 属性 | 维度 | 类属 |
| 教师的工作就是公共服务,就是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的理解是因为,不只要教书,我还要育人,我感觉育人比教书更重要。[1]……他们是以老师为榜样的,老师做了什么他们就学习什么,我就想到的是不只要抓学习,我还要抓他们的行为习惯,包括他们的那个三观。[2]……回来这里教书是因为我家在这里,再加上它也是我母校,我想为我的家乡做一点点奉献,我 2019 年毕业当时是考到邻县的一所小学,待遇要比现在在这里好一些,但是我还是持续关注这边的招考信息,一有机会我就考回来了。[3]……我待会还要护学,送学生回寝室,等学生睡得到 10 点半,之后再去备教材、备教案,这个弄过来,还要去弄我们学校的那些事,然后就得弄一些杂事,我现在都感觉这个人都憔悴了,我都感觉有时候我能不能分成两个人。[4]我想好好教书嘛,又想做好学校的行政工作,有时候都想把学校行政工作辞职了,然后我想我一个男人,如果我做这个都没有完成的话,我会感觉没有什么前途,而且我一直的目标就是先上位到副校长,然后我就一直坚持[5]……(共 36 个语义片段) | [1] | 职业充满使命感 | 使命担当…… | 被动担当—主动担当…… | 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 |
| | [2] | 有义务给学生树立榜样 | | | |
| | [6] | 有责任感为学生提供服务 | | | |
| | [3] [36] | 对自己民族有很强的依恋感 | | | |
| | [4] [11] | 愿意为学生利益牺牲自己利益…… | 主动付出 | 表面行为—内心感受 | 无私奉献 |
| | [19] [24] | 看到学生遭遇不幸感到难过…… | 关怀同情 | | |
| | [5] [27] | 期望获得更高职务和职称…… | 自我发展…… | 重物质—重精神 | 自我实现 |
| | …… | …… | 公共项目参与…… | 政策号召—主动发起 | 公共参与 |
| 合计 | 共 23 个标签 | | | | |

一级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类属化的过程,旨在用概念和类属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秉持客观、开放的态度,尽可能减少主观偏见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开放性

编码遵循了以下步骤:一是标记原始语句,即逐词、逐事件标记原始资料中反映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内涵及结构维度的原始语句;二是概念化,即对标记的原始语句逐句命名(贴标签)的过程;三是类属化,即是将零散概念进一步比较、整合,将相同和类似的标签合为同一类属,并归纳识别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示例见表2)。

具体而言,首先,研究团队共同阅读一轮、二轮访谈的所有文本资料,逐份、逐句、逐行标记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语义片段,并进行编号。筛选标准为“有清晰描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意涵或内容”。其次,为确保初始编码过程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我们采用了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的方式,逐份对受访者的访谈资料的原始语进行编码,直至概念达到理论饱和,再无新的概念标签产生。独立逐份编码结束后,研究团队共同逐份对编码结果进行比较、讨论、归类,将相同或类似的概念整合。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团队开展第三轮访谈收集原始资料,并结合观察和网络素材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再次确证无新概念产生。最终,经过多次讨论形成3个主类属、4个类属和10个类属属性(见表3)。

表3 一级编码结果

| 主类属 | 类属 | 类属属性 |
|------|-----------|----------------|
| 理性动机 | 公共参与 | 公共政策吸引、公共项目参与 |
| | 自我实现 | 自我认知、自我发展 |
| 规范动机 | 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 | 使命担当、职业道德、职业操守 |
| 情感动机 | 无私奉献 | 主动付出、关怀同情、奉献精神 |

2. 二级编码:确定核心类属

二级编码是对一级编码得到的各类属加以聚类的过程,旨在发现和建立类属间的各种联系^①。本研究在进一步编码之后,参照陈向明的做法,使用清理故事线的技术直接找寻核心类属,具体如下。

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都认同自己工作的使命,即是为国家教育事业做贡献、帮助孩子成长发展,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公共服务。然而,从事及坚守这一公共服务背后的动机构成颇为复杂。例如,最初选择就读师范专业以及毕业后回到民族地区当教师,是基于对自身综合资本(教育资本、家庭资本、社会资本等),和毕业时国家相关就业政策以及对自身和家庭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主要是理性、情感)的最优选择。在入职以后,真正感受、体验一名民族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并且面临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或再融合(冲突、适应及融合),与当地建立更加深厚的地缘情感(与地方、与学生、与同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名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职责与使命等等,共同(有情感的、规范的、理性的)构成了民族教师做好教育公共服务的动机。此外,在面临繁琐的日常教学任务、无休止的与教学无关的任务安排、抑或是难以融入当地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等困难下,结合自己对自身职业发展生涯的再审视(理性、情感、规范),最后将教师职业转化为终身发展的“志业”。概言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激发、维持、调节、稳定乡村教师投身民族地区教育公共事业,并坚守教师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推动力量,其动机的目标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在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公共服务动机组成的具体模式不同,且动机间存在挤出、增强及协同效应。

由此,研究团队对以上故事进行概念化,以形成定性研究阶段的核心类属——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整个故事均围绕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展开,尽管在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公共服务行为背后的动机构成模式不同。而其中,理性动机由公共参与、自我实现两维度组成,规范动机由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组成,情感动机由无私奉献组成。

3. 三级编码:关联类属

确定核心类属后,进一步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与维度整个关联起来,形成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模型(见图2),其具体关联过程及具体动机构成模式不在此进行赘述。

^①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4期,第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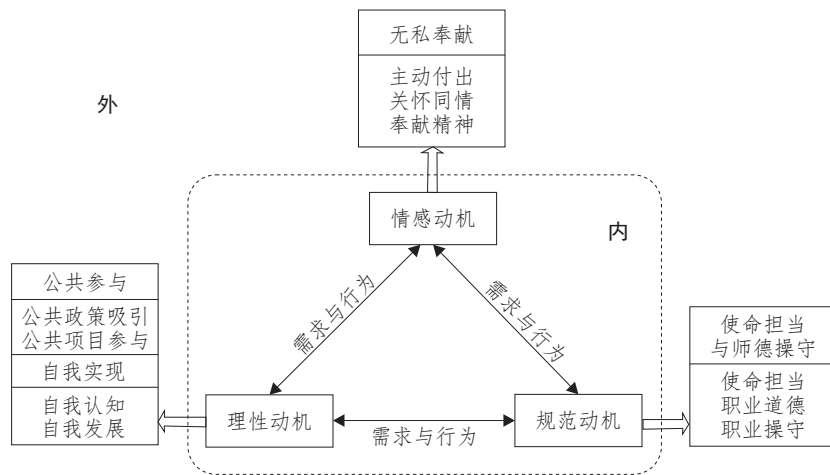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模型图

四 定量研究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测度探究

(一)量表编制

量表编制经历了“初始量表编制—量表修订—形成正式量表”三个阶段。其中,初始量表编制过程如下。一是依循概念及结构,基于本研究得出的4大维度(类属)和对应的10个类属属性,参考国内外已有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相关表述,回溯原始访谈资料编制测度问题。二是为保证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邀请5位民族学、教育学领域专家对初步形成的量表进行讨论。通过2次讨论后,综合专家意见、考量内容效度、文字表述的准确性以及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契合度后,调整题项,并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包含“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一般”、“较符合”、“完全符合”五种选项)来制定量表初稿。随后,邀请3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进行填写,并根据反馈意见调整量表,最终形成共32题的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初始量表(见表4)。

表4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初始量表问题

| 测量维度 | 属性 | 量表问题 |
|---------------|------|--|
| 使命担当与 师德操守 | 使命担当 | PSM4:我特别在乎我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一般规范。 |
| | | PSM18:我感到有责任通过教育服务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 |
| | | PSM20:我认为乡村教育是一项充满使命感的事业。 |
| | | PSM28:我会自愿做一些利于中华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的事情。 |
| | 职业道德 | PSM26:我认为身为一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在面对不良风气时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试着改变。 |
| | | PSM27:我认为师德对引导学生成长发展和民族地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很重要。 |
| 无私奉献 | 主动付出 | PSM3:对于职责范围外,但可能会促进学生成长的工作,我会积极参与并认真对待。 |
| | | PSM11:我对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发展非常关注。 |
| | | PSM16:我会经常思考,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作为教师的价值。 |
| 无私奉献 | 关怀同情 | PSM21:我认为我们肩负着民族团结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
| | | PSM5:我感到我有责任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 |
| | | PSM23:我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
| 无私奉献 | 奉献精神 | PSM32:我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以确保每个乡村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关照。 |
| | | PSM10:我真心喜欢学生并关心、尊重学生。 |
| | | PSM22:我很关注学生群体的利益。 |
| 无私奉献 | 奉献精神 | PSM31:我认为我的工作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很重要。 |
| | | PSM13:我觉得我的工作能体现我的价值。 |
| | | PSM19:我特别在乎我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名乡村教师的要求。 |
| 无私奉献 | 奉献精神 | PSM29:我作为一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这让我很自豪。 |

| | | |
|------|--------|--|
| 公共参与 | 公共政策吸引 | PSM1:我很希望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PSM2:我很愿意与他人分享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 PSM30:我认为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是自己应尽的公民义务。 |
| | 公共项目参与 | PSM12:我经常积极参与民族地区社区的活动,增进民族凝聚力。 PSM15:我乐于与民族地区社区合作,共同推动教育的发展。 PSM25:我对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公共项目很感兴趣。 |
| 自我实现 | 自我认知 | PSM6:我对于提升自己在教育领域的职业地位和声望感兴趣。 PSM8: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PSM14:对我而言,工资和福利是选择教育职业的主要动机之一。 |
| | 自我发展 | PSM7:我选择目前的职业是因为它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PSM9:我关注工作中提供的额外福利和奖励。 PSM17:我关心别人如何看待教师职业。 PSM24:大家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认可,对我非常重要。 |

(二)统计处理

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主要采用组成成分分析,因素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和最优斜交法旋转,计算工具为 SPSS 27.0,并根据因素分析结果进行理论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采用最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 ML)估计对模型进行拟合,计算工具为 AMOS 23.0。

(三)结果与分析

1. 初始量表的量化分析

初始量表涉及 32 题,主要通过问卷星发放,由研究人员邀请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填写,最终共收回问卷 349 份,删除填写时间过短、规律填写、乱填(如量表中设置了标记题,要求被试直接选择“一般”选项,没有按要求填写,则视为没有认真阅题)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 210 份有效问卷,符合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数的要求,即样本量,在题项数的 5 至 10 倍之间^①。

首先,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适合度检测结果显示本研究收集数据的 KMO 值为 0.94, 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2 = 8971.69$ 、 $p < 0.001$,说明样本数据变量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方法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题项进行删减:一是因素载荷小于 0.40 的题,剔除 0 项;二是在两个及以上因素上的载荷均大于 0.40 的题,剔除 13 项;三是题目不符合因素内涵的题,剔除 0 项。最终,共剔除 13 项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最大方差法和最优斜交法两种旋转方法,对剩余 19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抽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两种转轴法均抽取了 4 个因素,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82.71%,最优斜交转轴法抽取的因素结构与理论构思一致,且不存在交叉负荷的题项,故本研究采纳主成分最优斜交法的结果。

最后,检查是否存在题目冗余的情况。对删减后剩余的 19 个题项进行项目分析,根据总分排序对高分组(前 27%)和低分组(后 27%)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高、低分组所有题项的平均数差异值均达到显著(t 介于 12.23—23.05 之间, $p < 0.001$);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63—0.82 之间,符合同质性检验相关系数大于 0.4 的标准^②。此外,因素“无私奉献”、“公共参与”、“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自我实现”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64、0.923、0.957 和 0.897(均大于 0.8),各因素内部一致性好,依次删除各题项,观察各因素内部一致性系数变化,除删除 PSM12、PSM6 后其对应因素的 Cronbach's α 值略有升高,删除 PSM16 后 Cronbach's α 值不变,其余删除任意条目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降低,因此直接剔除 PSM12 和 PSM6 两个题项,而 PSM16“我经常思考,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作为教师的价值”与定性研究阶段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职业操守”联系紧密,且删除后内部一致性不变可继续保留,故不删除。最终,题项构成分

①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7 页。

②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第 181 页。

别为无私奉献(5题)、公共参与(4题)、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5题)、自我实现(3题),基于扎根理论开发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得到初步验证(见表5)。

表5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210)

| 题项 | 无私奉献 | 公共参与 | 使命担当 与师德操守 | 自我实现 | 删除该项后 Cronbach's α |
|------------------------|--------|--------|---------------|-------|------------------------------|
| PSM13 | 0.93 | | | | 0.955 |
| PSM19 | 0.81 | | | | 0.957 |
| PSM23 | 0.91 | | | | 0.959 |
| PSM29 | 0.96 | | | | 0.955 |
| PSM31 | 0.92 | | | | 0.952 |
| PSM1 | | 0.89 | | | 0.903 |
| PSM2 | | 0.87 | | | 0.904 |
| PSM12 | | 0.84 | | | 0.924 |
| PSM15 | | 0.92 | | | 0.894 |
| PSM25 | | 0.75 | | | 0.904 |
| PSM11 | | | 0.87 | | 0.946 |
| PSM16 | | | 0.76 | | 0.957 |
| PSM18 | | | 0.90 | | 0.944 |
| PSM21 | | | 0.91 | | 0.945 |
| PSM26 | | | 0.90 | | 0.944 |
| PSM6 | | | | 0.57 | 0.933 |
| PSM7 | | | | 0.92 | 0.858 |
| PSM9 | | | | 0.97 | 0.837 |
| PSM14 | | | | 0.95 | 0.821 |
| 信度系数 | 0.964 | 0.923 | 0.957 | 0.897 | —— |
| 方差解释率(%) (总 82.71%) | 57.253 | 10.855 | 9.181 | 5.423 | —— |
| 特征值(未旋转) | 10.878 | 2.063 | 1.744 | 1.030 | —— |

2. 正式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正式量表共涉及 17 个题项,也主要通过问卷星发放,由研究人员邀请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填写,共收回问卷 499 份,删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 300 份。

首先,依循前述理论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利用 AMOS 23.0,绘制初始模型(一阶四因素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模型的 $3 < \chi^2/df < 5$ 且 $RMSEA > 0.8$,模型拟合不佳。因此,可对模型进行修正,具体结合参数间修正指数(MI)和参数间因果性的理论支撑进行修正。通过释放 e13-e14(MI 值为 52.340,该值很大,两项之间存在紧密关系),PSM1“我很希望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与 PSM2“我很愿意与他人分享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都是测量公共政策吸引,两者高度关联,释放后模型拟合较佳,释放后 $\chi^2/df < 3$ 、RMSEA 和 SRMR 均小于 0.08、CFI 和 TLI 都大于 0.9,此时模型拟合较佳(具体见表 6)。

表 6 初始模型修正的各步骤的总体拟合情况 (N=300)

| | χ^2 | df | χ^2/df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模型评估 |
|------------|------------|-----|-------------|-------|-------|-------|-------|--------|
| 初始模型 | 356.644*** | 113 | 3.154 | 0.085 | 0.921 | 0.905 | 0.051 | 模型拟合不佳 |
| 释放 e13-e14 | 292.959*** | 112 | 2.616 | 0.074 | 0.941 | 0.929 | 0.045 | 模型拟合更佳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其次,进一步综合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修正后的初始模型基础上,尝试缩减因素,通过对比(见表7),可见二阶四因素模型与一阶四因素模型均符合要求($\chi^2/df < 3$ 、RMSEA和SRMR均小于0.08、CFI和TLI都大于0.9),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值明显优于其他模型,故认为一阶四因素模型结构更佳。此外,从一阶模型的拟合数据、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维度间相关系数在0.45—0.72之间, $p < 0.001$)及前文的理论研究来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可能存在高一阶的因素。从二阶四因素模型看,模型中各测量条目在相应因素上的标准化载荷量在0.69—0.88之间($p < 0.001$,见图3),能较好解释观测变量,说明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一阶因素和二阶因素的关系较强(除自我实现外其余因素在0.79—0.94之间,其中自我实现为0.39接近于0.4,且在定性研究阶段发现自我发展是促使教师积极投身民族地区乡村教育事业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确证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由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无私奉献、公共参与、自我实现构成。

表 7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PSM 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比结果 (N=300)

| 模型 | χ^2 | df | χ^2/df | RMSEA | CFI | TLI | SRMR |
|----------------|------------|-----|-------------|-------|-------|-------|-------|
| 二阶四因素 | 301.533*** | 114 | 2.645 | 0.074 | 0.939 | 0.928 | 0.049 |
| 四因素模型 | 292.959*** | 112 | 2.616 | 0.074 | 0.941 | 0.929 | 0.045 |
| 三因素模型(A+B,C,D) | 369.453*** | 115 | 3.213 | 0.086 | 0.918 | 0.903 | 0.054 |
| 二因素模型(A+B+C,D) | 483.730*** | 117 | 4.134 | 0.102 | 0.881 | 0.862 | 0.066 |
| 单因素模型 | 697.239*** | 118 | 5.909 | 0.128 | 0.813 | 0.784 | 0.091 |

注:A=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B=无私奉献,C=公共参与,D=自我实现

3. 正式量表的信度检验

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收集的300份有效问卷数据,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正式量表(共17个题项)及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整个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918,其中无私奉献、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公共参与、自我实现的Cronbach α 分别为0.878、0.887、0.859、0.778,均在0.7以上,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我国民族地区文化情境,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本土构建中国化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

其一,针对中国独特性的文化情境和教师职业的特殊,扎根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研究认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激发、维持、调节、稳定乡村教师投身民族地区教育公共事业,并坚守教师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推动力量,其动机的目标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与一般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相较而言,一方面,其共性在于两者都是激发和调控个体进行公共服务行为的一种稳定的内在心理因素,都同时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发展,都能通过公共服务行为的强度表征其动机的水平,同时两者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受个人特征、经验、价值观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个性在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范围、对象、内容、目标指向、组成更聚焦,更具文化张力。首先,从范围对象而言,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群体,表明了该动机是为了满足特定地域和人群对教育公共服务的需求,突出了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关注和支持;其次,从内容与目标指向而言,更加凸显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躬耕教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使命,更加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地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再次,从动机组成来看,民族地区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组成更为复杂和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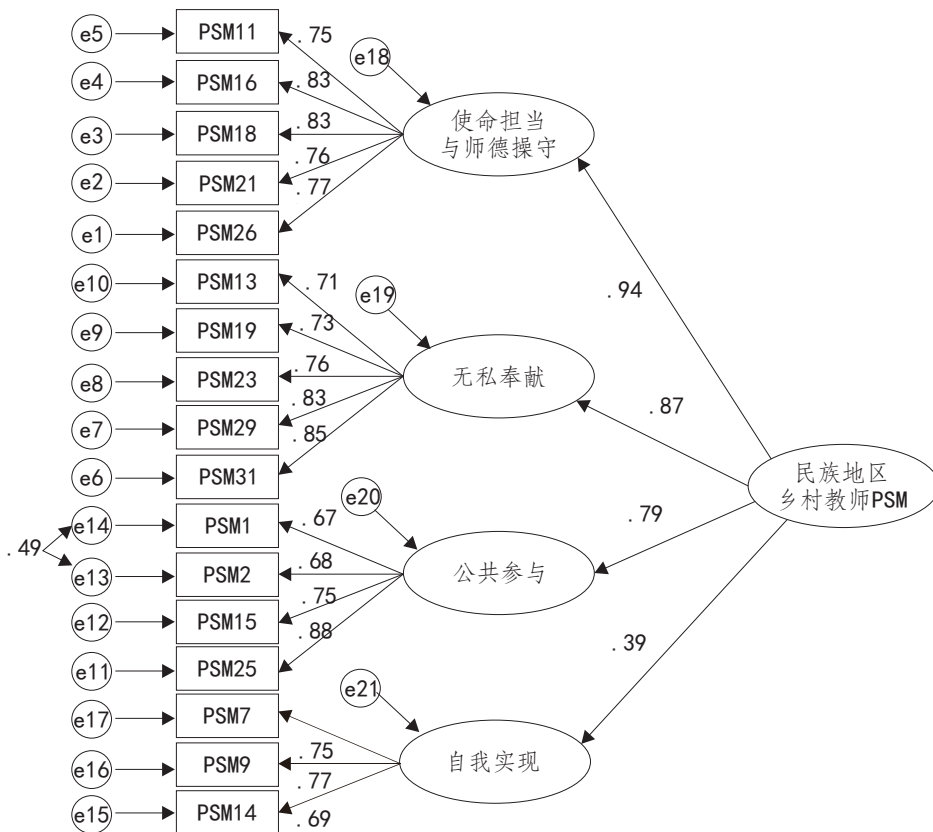


图3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PSM二阶因素模型标准化路径

样,其中多元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及地理经济环境是造成动机组成繁杂多元的首要因素。

其二,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验证公共服务动机普遍构成结构和通用测度。首先,与一般公共服务动机相似,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也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但具体意涵不同,说明基于理性的、规范的、情感的公共服务动机构成具有跨群体一致性与特异性。如理性动机是指基于个体的理性思考产生的动机,其目标指向亲社会及促进社会良善,包含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但自利动机一定是融合在利他动机当中;规范动机是指受到社会规范、教师职业准则和伦理规范的影响而产生的动机;情感动机是指个体情感体验和情感连接驱动的动机。其次,测量维度则包括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无私奉献、公共参与及自我实现四个方面。其中,“公共参与”、“无私奉献”与一般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维度相似,说明中西方情境下公共服务普遍存在“无私奉献”、“公共参与”两个维度,但这两个维度的具体行为表现及语言表达存在一定差异。最后,从结构与测量维度对应关系来看:公共参与和自我实现对应着理性动机;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对应着规范动机;无私奉献对应着情感动机。

其三,研究创新发现两个新维度,分别是具有中国独特伦理价值观念的“自我实现”,以及针对教师这一公共职业的特殊维度“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前者与我国高度的政党嵌入社会治理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相关,后者与民族地区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我国儒家传统、德治思想,以及目前中国公共组织的制度和环境相关。就“自我实现”而言,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集体、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自我实现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追求,更是个体将个人梦想融入民族梦想,最后汇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故对于民族地区的教师而言,通过教育工作实现自我价值、促进当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既是理性选择,更是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此外,就“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地位崇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责任,是道德典范。教师“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①,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教师还承载着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传承与发展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专刊,第78页。

重要使命,是民族振兴的纽带。因此,教师职业不仅是公共利益的承诺,更是道德化、责任化的师道传承,相较传统“公共利益承诺”,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更适宜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

其四,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共同确证在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没有单独“同情心”这一维度,而是以“无私奉献”的形式呈现。原因在于同情心在美国情境下具体为“当我看到人们处于困境时,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爱国主义包括关心他人的福祉”^①,这是一种爱国主义与关心他人福祉的无私行为;而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同情心不仅被视为一种情感品质,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是人性本善的体现,同时蕴含了道德要求和修身养性的重要价值。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职业使命,本研究更多地从无私奉献的行为出发,来概括教师对学生的同情心,传达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中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界定、结构维度划分开发出一套更全面、科学的测量指标体系,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提供科学有效的工具基础,能有助于控制已有研究中的外部环境偏差与内部测量偏差,以“中国民族地区的教育故事”与国内外公共服务研究领域形成学术对话,并实现研究结论更加有效地推广和应用。

其一,本研究以扎根理论的方法聚焦中国情境,突出对民族地区文化场景本土化的解释与建构,归纳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及维度。一是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问题之源。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时代命题出发,基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以明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内涵本质,提出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亲社会的、促进社会良善的,指向维护民族团结、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实现乡村振兴。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概念之源。在对比回溯中西方语境中“公”与“私”二者关系,明晰了中国语境中公共服务动机中“公”与“私”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竭私尽公、私从于公、私融于公的关系,从文化本源直明了公共服务动机所谓的“阴暗面”,即利己与利他之间并非只有“零和关系”,也可以是私融于公的“正和关系”。为从“公共服务”行为本身来把握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扫除了“利他主义”的桎梏。三是把“中国”意义作为研究的概念构建之基。扎根于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访谈资料,遵循“中国问题—中国文化—中国情境”,建构“情境—行为—动机”的归纳路径,从真实事件中总结意义、归纳概念。

其二,开发了在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过往鲜有研究结合国内外理论实证开发、建构并验证针对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本研究弥补了这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的跨文化研究,同时也为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符合情境的测量工具。此外,研究还发现与西方量表相似的“公共参与”、“无私奉献”两个维度,提炼出中国制度文化情境的“自我实现”和教师职业的“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两个创新维度,并从传统文化、组织情境等方面探讨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维度的差异与新维度出现的原因。另外,研究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得出,“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是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最显著的组成维度,该维度的题项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充分说明了在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中,“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维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1. 研究局限

虽然本文秉承严谨的扎根理论范式搜集、整理和分析编码数据,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研究结论,并遵循规范的量表开发步骤编制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对量表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但仍具有以下局限。

首先,扎根分析样本选择较为单一,可能会限制研究结论的使用范围。虽然在定性研究阶段,我们主要采用了理论抽样方法,确保了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各民族文化丰富多样,

^①James L. Perry, “Measur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Assessment of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6, no. 1 (1996): 10.

地理经济环境差异巨大,而这些都是影响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尽管本研究在特定样本中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但其适用范围和普适性仍需要在更广泛、多元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进一步确证,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反映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其次,尚未有纵向数据的追踪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仍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在量化分析阶段主要依赖于横截面的数据,来验证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开发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信效度。虽然这一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对当前状态下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初步理解,但它并未涵盖时间维度的变化。因此,要更全面地评估量表的信度与结构效度,未来研究还需通过纵向数据的追踪,观察量表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提升量表的结构效度,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动态变化。

2.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展开。一是开展跨样本验证分析。可以扩大调查研究数据来源,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验证本研究理论模型的普适性和稳定性。二是继续深化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机理研究。本研究已初步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组成结构,未来可深入探究不同类型教师及教师不同发展阶段下,理性动机、情感动机及规范动机的具体构成差异,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动机挤出效应”、“动机增强效应”及“动机协同效应”等。三是深化公共服务动机的因果机制研究。可通过纵向数据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等,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既可验证本研究量表的信效度,又可更深入地了解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因果机制。四是拓展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公共服务动机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自我效能感及学生学业成就等因素间的作用,特别是这些效应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以更全面地理解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机制。

[责任编辑:罗银科]